

台灣社會和平教育的可能性

雷敦蘇¹

從二二八事件在今日台灣的發展及其紀念館的成立，可以看到台灣在推行人權與和平的重視上，已有了一個起步，雖然具體的推行與教育仍有待加強。本文作者站在教育的立場上，視和平與人權互為因果，指出台灣社會要建立和好的社會，和平教育的重要性與可能性，不容忽視。

前言：和好與和平教育

三年前，輔仁大學設立了「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此後，這個中心就收集國內外大學和平學科的資料。和平中心也舉辦年度和平演講。第一屆演講有蘇南州先生討論〈台灣社會如何解決二二八後的悲劇〉，特別是如何使得明末之後就住在本島的人民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來台的人民和睦相處。一年之後，即1998年，和平中心與二二八紀念館有了初步的聯繫。兩個單位一起參加當年國際和平博物館的研討會，也因此兩個單位有更密切的合作和交換。輔仁大學的和平中心與全世界的學術和平中心和大學系所，有比較多的來往；紀念館對台灣社會有比較深的投入，使得兩個單位有互補之益。

本文針對和平中心能提供的資料作探討。和平中心為紀念館提供資料，不僅為紀念館而已，更是為推動台灣社會的和好。

¹ 本文作者：雷敦蘇神父，英籍耶穌會士，現為輔仁大學副教授，以及「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主任。

因此，本文也希望能藉此機會介紹一下和平學科和平教育的內容、本質和重點。

一般人也許同意，和平是社會要追求的目標之一。但只作為目標並不等於接受「和平學」為一門專題課程。其實在今天的台灣，應該承認：未來幾年當中，創立大學和平學系的可能性不大，甚至根本不必提。雖然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成立和平學系，卻不表示和平教育是不可能的。筆者將和平學分為「和平學科」即專題課程，和「和平教育」即進入學校的各種課程的廣泛教育。下面就稍微介紹「和平學」和「和平教育」。

大體來說，「和平學」是一種跨系多元學科，就和平的角度來研究社會。和平學有點像醫學一樣。醫學需要靠化學、生物學、心理學等作為科學基礎，方能針對人間之病苦發展出醫療；同樣，和平學是建立在社會學、心理學、歷史等學科，面對社會的不安提出治療的辦法。

「和平教育」的方向是一樣的，只是作法不同。和平教育是針對每一門課特別強調和平，以及導引和平的方法。譬如，過去歷史常談打戰，注重君王，卻忽略了和平，歧視貧民；著名的文學作品如《三國演義》，是一部殘忍流血的小說；物理學先發展原子彈才有核能發電廠。和平教育則要求我們以另一種方式教授這些課程，強調另外一面。

不僅是課程的內容要有所改變，甚至教書的方式也可以修改。龔課思（David Hicks）這樣形容和平教育：

「讀書的氣氛必須包括合作、參與、對話和自主...，這樣提醒我們和平的目標該用和平的手段，非和平手段無法締造和平。過程和目標是一致的。同樣，教師、職員和學生也要有和諧的人際關係。²」

² Green, K., *Peace education in Great Britain*, in Woodhouse, Tom(ed), 1991.

當然，這些方式不限於和平教育，不過和平教育應該特別重視合作和參與。老師和學生共同研究、學習。

和平教育要推動一些基本態度和做事的方法，使得未來的人們能夠享有一個和諧的社會。在這方面，重點不是知識而是生活的態度。如僕拉薩德（Prasad）所說的：教育應該從迫害攻擊性中，將人拯救出來。

關於和平教育的內容，龔氏和漁人（Fisher）提出四個大題目：和諧與衝突、社會福利、正義與平等，以及環保的關心。這些題目可從小規模或大規模考慮，譬如，衝突是國際的問題也是家庭或工作單位的問題；環保的關心涉及到核能發電廠以及個人的垃圾分類。總而言之，這些課題就是要推動社會責任感。國際安全、家庭分裂、族群仇恨，不能只當作客觀研究的題目，因為你我都有責任處理這些問題。這樣的和平教育，要強調每一個人的責任。

由於和平教育強調人的責任，因此不可不提人權問題。有責任的人面對災難或受迫害的人，應有責任感為受壓迫者及受迫害的宇宙辯護，推動更公平的社會。把人權教育擺在和平教育之下是自然的，也是必須的。若不注意和平的氣氛，人權的要求很容易引導抗議，甚至暴力的行為，忽略社會的責任。歷史上的革命常呼籲公義、平等，但後來陷於暴力殘忍的行為。因此和平的關心必須引導人權的關心；人權的關心必須留在和平範圍內。

雖然如此，仍要承認人權教育可能與和平教育有某些矛盾。人權的呼籲也許更強調社會的分裂與和平教育方向是相反的。同樣一個矛盾產生於聯合國和平部隊帶武器施行保護受迫害少數民族的政策。和平部隊帶武器難道沒有矛盾嗎？探討此

問題時，我們就必須面對人權、和平的定義和軍隊的作用。一個不打戰的國家也許符合「和平」的條件，不過假如是國有制度性地壓迫人民的現象，則有人權問題，而這種和平是值得的嗎？為一般老百姓來說，國家的制度不僅要保護國際和平，更重要需要保護自己的生命。因此和平也包括全國的和諧。

二二八紀念館列在和平博物館的名單，同時注重人權問題。所紀念的事情是政府壓迫部分人民的殘忍行爲。博物館由二二八事件發展到原住民、弱勢者以及其他受迫害的人民。紀念館作展覽、辦活動的目的，是希望社會各級人員意識到這些弱勢者團體，並與他們和好。這樣的紀念在某一種程度上，要作國家的良心。不符合良心的平安就不算平安。今天的博物館與大眾媒體、藝術展覽等，都是要提高人民的良心。

由此可知和平教育與博物館等單位是分不開的。希望這篇論文能幫助我們更看重這一點。

一、二二八紀念館與和好

若望·賈樂同（Johann Galtung）是和平學之父。1998年他在日本討論和平博物館的基本特色，為和平博物館作了如下定義：

「一個和平博物館讓我們認識和平以及告訴我們如何到達和平。其實在和平博物館我們不需要很多談戰爭的資料。譬如，我們可以討論健康，如何修養自己，而不必提到疾病。不過，由於所有好的教育是辯證性的，看到背面就更能夠了解正面。今天所謂和平博物館幾乎都是反戰博物館，很少提到和平，而除了廢除戰爭、否定戰爭，就沒有其他導致和平的方法。³」

³ Galtung, J., *The Theory of Peace and the Practice of Peace Museums*, in

在會議中，賈樂同提出博物館的新的方向。他先用一個比喻來闡述他的想法。

在法國首都巴黎有名的凱旋門，遊客要先走過「偉大軍隊大道」或另兩條由將軍得名的街道，而後過了凱旋門，就到了「天堂田園大道」，所象徵的是戰爭帶來的勝利及光榮，就可以進入天堂了。其實戰爭所帶來的是殺人、毀滅、貧窮和痛苦。

賈樂同建議應該有六條以和平為名的街道。前三條稱為「衝突轉變大道」、「非暴力大道」和「世界政府大道」，經過凱旋門之後就有「裁戰大道」、「和平制度大道」和「和平文化大道」。博物館會有這些展覽，有時某一條路走不通，問題太複雜，也許有地方可以坐下思考，與他人談談，最後要回到中心走另外一條街。博物館沒有固定導覽路線。

除了提供歷史的資料之外，展覽該幫助觀眾締造未來。博物館要啓發人的想像力：假如沒有某一戰爭，今天的世界會如何？假如不浪費錢買武器，到底可以為窮人作多少慈善的工作。

目前聯合國在奧國的一個古老城堡剛開了類似賈樂同所盼望的博物館。在台灣，賈樂同的梦想是非常值得探討的。若沒有二二八事件，沒有白色恐怖，我們的社會會怎樣？也許閩南話、客家話更廣泛，大學生不會忘掉母語，台灣更快進入民主時代。

二二八紀念館的重大問題之一，是缺乏資料。由於白色恐怖，人民不敢保留當時的資料，因此展示品本來就不多。另外一個基本困難是，這樣的紀念館只面對歷史上的一個事件，若一直只限於此事件，展覽本身快便會變成歷史的文物，人們不

會有興趣再去參觀。賈樂同的夢想提供一個希望：紀念館可以探討如何避免類似的事件再度發生，可以設法提供一個沒有白色恐怖的台灣夢境。

幸虧二二八紀念館到現在正避免一個很大的危機，也就是利用歷史的痛苦來燃起人民的憤怒和抱怨。很容易利用二二八的悲慘，控告國民黨和所謂的外省人。在背景的盧溝橋，有一座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雖然此紀念館願意推動和平的精神，但是它把重點放在愛國主義，如其介紹書所云：

「中國政府爲了不讓人民忘記過去那段既屈辱又自豪的歷史，在全國各地建立了各種類型的紀念館。這些紀念館的建立，有利於廣大人民學習歷史，激發愛國熱情，堅定和平信念。⁴」

當然，愛國是件好事，應當贊成，但若不同時強調裁軍，以和平的方法解決衝突，愛國很容易變成戰爭的出發點。開會時筆者提出這個疑問。大陸的學者回答說：中國是一個喜愛和平的國家，不打仗的國家。若真這樣，那麼我在六四所看到的坦克車是作什麼用的呢？爲什麼解放軍必須在台灣海峽做演習？愛和平的國家不需要演練如何侵略他國。換言之，盧溝橋的紀念館應該推動和平，並反戰；雖然反對日軍的惡性，但不忘記鼓勵中國人愛日本人。

相反，二二八紀念館不願意推動任何仇恨。承認歷史的悲劇是正確的，反對暴力是對的。一座抗日紀念館可以導致觀眾了解日軍的可怕性，與此同時，也要推動與日本人和好。所反抗的不是日本而是軍隊的惡性。因此要啓發反戰、反不合理的暴力、愛和諧及國際的和好，愛國精神不是重點。二二八紀念館的展覽不會引導觀眾恨外省人或恨國民黨，而是幫助人民了

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介紹書》，1998。

解暴力在無法律保護之下，或在惡法制下的悲慘。因此館長同時會注意現代社會的弱勢團體，為他們呼籲，使他們不落於同樣的悲慘。

在京都的會議中，庸寬格教授（Nigel Young）討論了紀念的意義⁵。他認為「紀念」不是「追悼」。追悼強調過去的悲劇和榮譽，是對英雄所提的；紀念反而是坦白地講事實，不加讚美或批評。紀念能夠幫助一個國家或一個族群面對他自己不願承認的惡性。二二八紀念活動就使台灣面對他自己的錯誤。能夠這樣作，表示社會真有進步，如論語所云「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

當然，有某些人或組織會批評紀念館是在搞政治。恐怕這種批評是免不了的。在日本，和平博物館一提到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真面目就有人批評，甚至打電話恐嚇館長。奧國、德國也遇到類似的問題。在台灣，事情不是那麼嚴重，大多數人承認白色恐怖的惡性，沒有任何團體否認當時有無辜者死亡。這就表示台灣的成熟，樂意改過的精神。

二、和平教育

前言已提到和平教育的基本特色。龔課思認為，和平教育從知識到結果有明顯的要求⁶。他畫了一覽表，分別「知識」、「題目和層次」、「態度和能力」。如下：

⁵ Young, N, *Peace Museums,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Creation of a Peace Culture*, in Kyoto Museum for World Peace, Ritsumeikan University, 1999. *Exhibiting Peace: The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eace Museums Nov 6~10, 1998*, pp.17-21.

⁶ Green, K., *Peace education in Great Britain*, in Woodhouse, Tom(ed), 1991. *Peacemaking in a Troubled World*, New York/ Oxford, Berg, pp.141~159.

〔和平教育覽表〕

知識

- 一、描寫
- 二、分析
- 三、評論

題目和層次

一、衝突	個人生活
二、福利	社 區
三、正義	國 家
四、環保	世 界

態度

- 一、自尊
- 二、好奇
- 三、開放
- 四、賞識他人
- 五、公平
- 六、責任感

能力

- 一、表達自己
- 二、理論
- 三、溝通
- 四、同樂感苦
- 五、解決衝突
- 六、政治能力

無論知識的內容何在，其處理方式要強調學生的主動處理，所謂的分析與評論。若教育重視背書、機械模仿地重複老師的話，學生就沒有機會自己去思考、批評。因此和平教育要推動一些態度和能力，使學生能夠處理每日的衝突和遇到的情況。未來，人不需要知道更多，乃需要知道如何處理衝突、締造和平。這樣，和平教育不需要設立新的課題，更有利於所有

的課程，幫助學生製造和平教育的態度和能力。

如何推動某種態度，大概是教育界早考慮的問題。由筆者的觀察來說，老師重複道德規範、老板罵工人不好，效果肯定不大，反而導致學生有反抗心理。恐嚇和指責無法幫助學生自主。合作、自己寫報告、研究題目、找資料、分析和評論，甚至提出與老師不同意見，乃是正確的道路。台灣的教育制度在官方教育上，大體不允許這些創造性的教育，學生要在社團活動中學習合作、溝通、幫助他人等。同樣，在國家政壇上有同樣的反映：以九二一地震的災民為例，民間社團容易直接協助痛苦的災民，政府機構對社會需要的回應反而比較慢。人民的創造力表現於民間層次；官方層次有利處理一般正常的情況，很難面對非常時期的例外情況。和平教育的要求是希望能提高官方的創造力。

三、和平學教育

以「和平」作為專門學科是一個新的現象。英國布雷德福（Bradford）大學和平學系之前主任康乃爾（O'Connell）覺得此現象來自三個理由：

- 一、社會科學本身是新的，比如：從亞里士多德到 1900 年，西方的政治學沒有多少變化；
- 二、和平的問題都擺在歷史學或政治學課目中講授；
- 三、很多國家重視國家安全和軍事力量，輕視和平，把它當作不愛國的表現。

因此和平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誕生的⁷。第一位創

⁷ O'Connell, J.,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eace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Tensions of Scholarship*, in Woodhouse, Tom(ed), 1991. *Peacemaking in a Troubled World*, New York / Oxford, Berg, pp.107~121.

立現代的和平研究中心，就是挪威籍的反戰者賈樂同先生。

和平學大量地進入大學體制，是在英國布雷德福大學開始的⁸。1960年代，英國政府決定讓布雷德福專科學校改制為大學。當時校長要求該大學不只為提高學術知識而努力，他還加上一句「知識要應用為福利人生」。何謂「福利人生」？校長說，是解決社會的最大問題，即饑餓和原子彈。

該大學附近有所基督教貴格會的教堂。貴格會從十八世紀創辦以來，一直反對戰爭、推動和平。剛好布市附近的貴格會想用他們的資源投資和平研究，就與該大學合作，在幾個禮拜之內，就籌到足夠的錢創立和平教授職位。第一位任教的是貴格會哈佛大學教授古亞當（Adam Curle）。古教授曾經研究社會心理學，被英國政府派往世界各地受內戰暴亂的國家服務。古教授在就職演說中強調三點：

- 一、以系統方式研究當代或歷史中的重要問題；
- 二、應用分析的方法；
- 三、提供良好的基本教育。

新系的一個特色是要求三年級學生前往社會或國外實習。

和平學系就這樣開始了。充滿理想和希望，不過缺乏實際的經驗。古教授的任職到期，康乃爾教授就當系主任。康教授規劃課程，分六種課題：

- 一、和平哲學：討論的是和平的本質，和平與正義的關係，義戰與和平主義等題目；
- 二、個人、家庭、學校內的和平：重點是偏向於心理學和家庭內的溝通；

⁸ McKinlay, R.A., *From Harvard to Bradford*, in Woodhouse, Tom(ed), 1991. *Peacemaking in a Troubled World*, New York / Oxford, Berg, pp.58~72.

- 三、國際安全：所提到的題目有國際關係、戰爭肇始之因，武器貿易和武器的科技發展；
- 四、和平與發展：此項目討論富有與貧窮國家的關係，世界資源的分配等；
- 五、工業社會：如何解決社區、工廠的衝突和種族的分裂；
- 六、衝突之個案研究⁹。

康教授看重和平學為跨系學科，他說：

「社會學已涉及此類問題，但『和平學』更以專門的方法研究，利用社會學的方法，且以跨系的合作方式進行。今日的和平問題，是一種共同為人類發展，以及面對暴力，種種混亂情況之下的合作問題。」

布市大學和平學系由 1973 年設立之後，發展為歐洲最大的和平學系。關於和平學的未來發展，值得參考美國和平學者羅陪子教授 (George A. Lopez) 的報告¹⁰。羅氏提起以下六點為未來和平學發展的方向：

- 一、國內解決衝突的方法與國際解決衝突的過程，應該作進一步的聯繫，使得成果能在兩個區域用得到；
- 二、跨文化衝突越來越明顯，應多注意各文化如何了解社會；
- 三、要想辦法應用人的想像力，創造新的未來；
- 四、繼續研究非暴力的傳統；
- 五、如何認定國家安全，以及國家安全與和平正義、國際安全的關係；
- 六、更上一層樓，從更擴展的角度看和平的題目。

羅教授的計劃符合賈樂同為博物館的設計。「和平學」和

⁹ 康乃爾，《和平研究的可能性》，輔仁大學：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和平叢書 1，1997。

¹⁰ Woodhouse, Tom(ed), 1991. *Peacemaking in a Troubled World*, New York / Oxford, Berg, pp.346~347.

和平博物館都願意推動擴展的空間。若觀眾離開博物館感覺到過去的想法要改變，博物館就成功了。若博物館只加深大家的偏見，它就沒有資格稱為和平博物館了。同樣大學的「和平學」要啓發學生，以新的眼光看歷史，以新的精神創造未來。「和平學」是應用知識，如同和平博物館不盡作過去衝突的展覽，且要推動現代社會的和諧。

除了教書之外，大學也是研究的機構。在和平學的研究上有幾個重要方向。美國和平研究院和類似政府機關，主要工作是衝突的解決，幫助衝突中的人民代表坐在一起，解決問題。另外有一些大學把研究對象作為武器、軍隊和戰爭的角色。在這方面，密歇根大學的桑爾教授(J. David Singer)是最有名的。桑爾教授曾經來過台灣的政治大學作過訪問。他以科學的統計方法研究戰爭的後果。同樣有不少學者研究武器的發展和重量。和平研究的第三個方向，是如何締造社會的和平。由於前面兩項的內容很容易了解、收集資料就偏向於此，而後者則模糊不清，難以認定。

除了和平研究的內容之外，有另外一個很敏感的問題，即和平學研究與和平運動的張力。有的學者認為，研究和平的研究員必須積極參與和平運動，他們就排斥像桑爾教授的研究者，希望所有和平學者實際參與熱烈的反對戰爭。但其實，大學的教授不一定是最好的行動者，所以有些的學者不贊成研究員上街參與示威。

研究中心與實際推動和平工作者應該有何種關係呢？輔仁大學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首次年度和平演講者蘇南洲先生表示他的期望：

「這是台灣第一個和平對話中心，我蠻希望這個中心設在輔仁大學，可以成為台灣一個和平的燈塔，然後能讓從事和平工作的人，或需要和平的人，在他們心中燃起一

個火光、一個熱、一個溫暖。¹¹」

蘇先生不要求中心本身變為行動推動團體。他希望中心成為和平工作者的燈塔，具體來說，收集資料、反省、提供新的概念。中心與二二八紀念館的合作就是靠這種精神。紀念館能把和諧、寬恕、合作的精神落實於民衆；研究中心的作用，則是幫助一般人擴大其想像力的思想範圍。

四、和平與人權教育

1999年的教宗和平文告以〈和平的秘訣：尊重人權〉為題目¹²。教宗說：「各種人權都受到充分的尊重，世界都能享受和平。」早在1969年，教宗保祿六世的和平文告，題目便訂為〈走向和平的途徑便是促進人權〉¹³。教宗把和平當作人權的基本條件，他也指出：「和平與人權互為因果；和平有助於人權，人權有助於和平。」教宗知道天主願意所有的人，特別是最弱勢的人，能得到基督的和平。和平不可能限於發達社會、富有的家庭。因此和平與人權分不開。

從另一個角度看，和平學與人權教育的密切關聯，已由澳洲雪梨大學和平研究中心主任李思教授（Stuart Rees）所提出。李教授從實現和平在社會中的角度討論，認為促進人權就是締造和平。人權若不受到尊重，就不能提到和平。也許從表面上看，即使某國家沒有戰爭，但若不尊重人權，那麼這個國家的基礎和基本制度仍是有問題的。羅馬帝國曾經自豪有「羅馬和

¹¹ 蘇南州，〈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年度和平演講手稿〉，輔仁大學，1997。

¹² 輔仁大學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編，《尊重人權，促進和平：1968年至1999年教宗世界和平日文告》。

¹³ 輔仁大學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編，《尊重人權，促進和平：1968年至1999年教宗世界和平日文告》。

平」的稱號，不過，雖然羅馬帝國內長期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但不能否認的，羅馬帝國依靠奴隸制度的存在。

今天的台灣才剛開始推行人權教育。雖然人民和政府更看重人權，不過事實上仍存在一些不符合人權概念的想法。東吳大學政治系系主任黃默教授曾在做大學問卷調查時發現：「我們的大學生對權利的認識還是不怎麼清楚的。譬如，調查發現46%學生贊成限制與政府有不同政治意見的人士出入境。¹⁴」死刑也是人權問題之一。本人雖然沒有統計資料，但是我想，似乎台灣大部分人是贊成死刑的，好像法庭判斷某人殺了人，犯人就不算是人，可以把他判死刑了。這些案子證明台灣在人權方面的認識，仍缺乏基本原則：無論作、想作、說要作什麼事情，人永遠是人，不能失掉其人性和所應該得的尊嚴。

中國哲學強調義務使得人民樂意工作，可能輕視基本人權，這也是一個原因：人權受不到應有的尊重。不少辦公室和工廠要求工作人員加班，卻不付加班費；工人也不反對，而常加班，若真受不了，就輕易地辭職，另找工作。由於台灣失業率低，很容易找到新工作，因此工人的權利就永遠得不到改善。工人辭職，老板換人，以同樣的作法對待新人，直到他又辭職。換言之，工人的權利等於只有辭職權而已。也許將來失業率會提高，使得工人不願輕易辭職，希望他們會更進一步建立工會，推動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謀求工作環境的改善。

如同和平教育分廣泛教育和專門課題，同樣，人權教育也有兩個層面：基本教育在推動一些價值觀，可以配合任何一門課同時進行；另有專題人權課程。當然能上專題人權課程的學生，不可能包括全國人民，所以應該強調人權價值觀。不過不

¹⁴ 黃默，《美國與台灣大學人權教育》，輔仁大學：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和平叢書9，1999。

能否認專題課程有促使力，可以推動知識分子領導社會大眾往人權之路邁進。

在此背景下，政府希望推動人權教育。教育部希望教育涉及到教育的每一層面，由幼稚園直到大學。然而，教育所面臨的問題，除了基本上對人權的認識不足之外，還有三個問題：一、缺少老師；二、缺少中文教科書；三、缺少課程的安排。

第一點是很容易理解，因為缺少人權教育，所以除非是就讀國外的學校，一般老師就不知如何教人權的課題。不過，目前有些老師在國外研究過人權的法律，還有少數上了人權課程的訓練，不過這些人的問題是，回國之後很難找到教書的職位。

第二點是我們要慢慢補充的一點，像輔大和平中心委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朱榮貴教授編輯清末民初思想家對人權的了解，以作為教科書之用；另外，我們也可以用網路等方法查詢新的資料，提供人權教育的書籍、刊物等。

第三點，人權課程的安排是比較困難的。在某些方面，社工系、社會系和法律系會注意弱勢者的權利，也許不特別提及「人權」這個名稱。關於專門設計人權課程，日本大阪桃山學院大學作了值得參考的辦法。該大學有人權課程作為共同必修課而且很受歡迎，使得學生亦可更深入題目選擇其他人權課題。除了傳統上課方式，桃山學院大學還有幾百卷錄影帶和電影可以幫助學生反省。

日本社會比美國社會更接近本國，因此值得了解日本人權教育的特色¹⁵。日本人權教育的特色是重新讀日本的歷史。美國的人權教育可能更注意現代的不平等現象，不可能像日本那樣，回到一千年前的歷史。日本過去社會階級劃分明顯，階級

¹⁵ 張心梅譯，《日本人權要覽》，輔仁大學；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和平叢書5，1998年。

僵化爲封建制度，因而產生部落的存在。日本江戶時代（1615~1867）有武士、平民、商人、穢多和非人等嚴格的階級制度。「穢多」階級的人民處理死牛馬和從事皮革業；「非人」階級是那些被禁止從事生產活動的人。由於當時首都在京都，關西地區的部落對在大阪、京都地區的歧視特別嚴重。直到今天，這地區的穢多和非人後裔仍遭受歧視。人權教育就以這個問題爲重要問題之一，並以更徹底的認識日本歷史爲解決問題的方法。

日本人權的第二個重要題目是原住民，不過由於人數不多，且大部分住在北海道，沒有受到那麼多的研究。除了北方的原住民，也有南方的沖繩人。爲台灣來說，這兩群人比較重要。台灣原住民比日本多。目前台灣以新的眼光讀歷史，開始重視閩南人和客家人在 1949 年以前的貢獻。不過很少從原住民的立場談歷史。課本不會承認明代來台的人侵佔了原住民的土地，欺騙他們，殺害他們，佔領了他們的寶島。在這方面，台灣人還沒有足夠的了解。

日本的其它人權問題大體上與他國一樣：對婦女、殘障人士及外籍人民（如往日的韓國人）等的歧視，以及工廠意外迫害人身等環保問題。本人發現，最容易了解日本人權範圍的方法是去參觀大阪人權博物館，展覽就引導觀衆投入日本的歷史和少數民族文化。可見，活潑地展覽對觀者的影響很大，不容易忘記。也許台北的二二八紀念館可以學習。

結 論

賈樂同曾在提及和平教育的重要性時說，我們日常用的語言常保持暴力和殺人的比喻。改變傳統語言是不容易作的事。我們日常說某某人大敗，另外一位得勝。奮鬥，鬥爭竟變成了

美德？甚至爲了和平而去鬥爭？難道可以用「鬥爭」來說明創立和平的手段嗎？這些說法就證明和平教育的路是很辛苦的。日常比喻中也保留一種宿命論：戰爭是人生的一部分，無法避免。《司馬法》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到了唐代吳兢寫：「中國雖安，忘戰則民殆」。宋代蘇軾則說：「天下雖平，不敢忘戰」¹⁶。這些話傳流至今，使我們不能不感到遺憾：人們何時學會和平，而不打戰？

這並不是說和平學一定得推動「和平主義」。和平學要我們建立更平靜的國際社會，需要很大的勇氣，放棄武器用和平來改造社會。人人都希望有平安，不打仗。孟子說「春秋無義戰」，也就是說春秋時代的戰爭，沒有一個真的是爲「義」而戰的，孟子盼望永遠沒有戰爭。我們爲自己、爲孩子，是否也願意建立這樣的社會？我們是否願意把寬恕、包容、原諒等美德，作爲理想人物的美德，或者要像古人一樣佩服殺人的將軍、打戰的英雄，視他們爲偉大人物？這些問題是和平教育要向我們提出的。答案是我們自己的事。

¹⁶ 《中國古代名句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